

政府评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基于我国质量奖的多期 DID 检验

罗连发 王昇唯 朱芳靖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近年来我国政府举办的评奖活动数量呈上升态势,本文以质量奖评选为对象研究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质量奖评选对企业可能产生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同时获奖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补贴。本文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以上三个可能的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获得质量奖后绩效指标显著下降,政府补贴数额显著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获奖之前企业进行了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支持了迎合效应和补贴效应,不支持激励效应。本文的启示是:企业对政府评奖存在迎合行为,使评奖行为偏离其目标,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关键词:质量奖 企业绩效 迎合行为 资源配置扭曲

中图分类号:F062.9 **JEL 分类号:**O12 D21 L53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以改革的方式来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些改革主要包括:减少妨碍市场进入的行政性壁垒,如商事登记改革、行政审批改革等;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大幅削减收费事项、降低企业税负等;对各监管部门的执法职能进行合并,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制定公平竞争审查政策,防止政府部门出台不利于公平竞争的规章制度;等等。据统计,2013—2020年,国务院已经分13批取消和下放745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取消608项,下放137项。^①然而,我们看到在政府对于市场主体的禁止性、约束性行为不断减少的同时,各类激励性行为也在快速增长,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部门举办的面向企业的评奖活动数量在不断增加。我们对2002—2018年涉及企业生产经营较多的中央四部委^②的法定审批数量和评奖活动数量进行了统计,其中行政审批事项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布的历次行政审批事项清单,评奖活动数量来自各部委网站发布的评奖通知。将两个数据指标描绘于同一图中(见图1),我们可以发现行政审批数量呈现快速且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各部门所设立的评奖活动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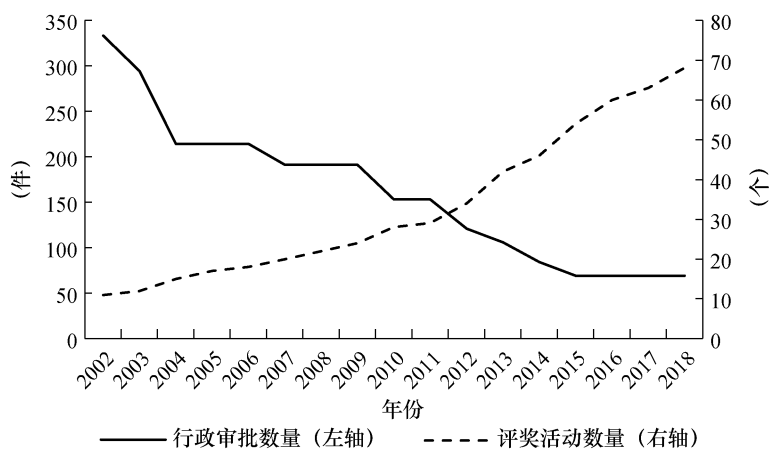
^{*}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错配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CJL028)的资助。作者感谢武汉大学程虹教授、叶初升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学习明明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状、周倩等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研讨会参会者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数据从国务院网站中关于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相关决定中汇总得到。

^② 中央四部委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其中,国家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在2018年的行政机构改革中合并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则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日渐增长的政府评奖活动数量，对于市场主体会带来何种影响？是激励了市场主体的效率提升和创新行为，还是作为另一种变相的市场干预而损失了效率？现有文献对于各类影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约束性措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于评奖这一类激励性措施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图 1 中央四部委行政审批与评奖活动数量变化



政府举办的评奖活动数量持续增多，深入研究这些活动对企业的影响，是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本文试图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识别政府评奖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企业在参评质量奖过程中采取的行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奖项的影响力，本文选取政府质量奖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对实证分析数据来源的介绍和回归结果的呈现；第五部分是对基准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和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质量奖对企业影响的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政府评奖的研究还较少，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一省份的获奖企业对卓越绩效模式的影响和效果进行评估。熊伟和王娟丽（2013）基于随机抽取的浙江省424家企业来研究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的各个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的成效更为显著。曾珍和王宗军（2017）研究了349家推行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发现质量管理实践各因子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领导支持对企业绩效影响最为显著。黄顺春和盛夏（2016）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的方法对2014年全国163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正向效应。Wen等（2017）通过反事实的分析方法对安徽省获得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推行卓越绩效模式有助于增加企业投资。

国外的相关研究中，Boulter等（2013）的研究结果证实，获得质量奖的企业有更好

的业绩表现。Howell (2017) 发现, 获得奖项的企业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外部融资, 且这一现象在有融资约束的企业里更为显著。获得奖项的企业往往有更长的存续时间, 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 (McKenzie, 2017)。此外, 国外众多学者对企业获得质量奖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研究, 其中大多数文献指出股票价格会对企业获得质量奖做出积极反应, 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Hendricks 和 Singhal (1996) 指出获得波多里奇质量奖这一信息会让企业当天的股票价格上升 0.59%—0.67%, 这一影响在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可让小企业的股票价格上升 1.16%—1.26%。但是 Adams 等 (1999) 进一步拓展了 Hendricks 和 Singhal (1996) 的研究, 指出企业所有者、管理者 and 分析师应谨慎地期望从获得质量奖中取得额外的回报, 原因在于是实施卓越绩效模式而不是获奖使得股东获得额外收益, 而实施卓越绩效模式产生的收益在获奖前和获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获得。Tuck (2005a, 2005b) 对欧洲质量奖和马来西亚总理质量奖的研究表明,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 获得质量奖这一信息不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Lin 等 (2013) 对台湾质量奖的研究表明, 获奖企业 and 非获奖企业的平均回报率没有明显差异, 但其进一步研究表明实施有效的质量改进计划可以为企业的市场价值提供长期回报 (Lin 和 Su, 2013)。

(二) 企业迎合行为的研究

迎合行为最早被定义为职业经理人为了迎合投资者情绪变化而改变投资决策的行为, 而后这一概念逐步被学者引入政企关系的研究中, 代指企业为了某些目的去迎合政策制定的偏好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Dosi 等 (2006) 发现策略性行为存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中, 指出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是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不是为了真正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无独有偶,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在研究国内企业创新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策略性行为。他们的研究发现, 企业除了推动技术进步和保持竞争优势, 还存在以其他利益为目的的创新活动, 当企业预期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 企业的专利申请会显著增加, 为了“寻扶持”而创新。谭小芬和钱佳琪 (2020) 证实了企业在面临卖空威胁时也会采取类似的专利迎合行为。

这一策略性行为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杨国超和芮萌 (2020) 认为政府产业政策具有“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 发现存在迎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以期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 而无意真正从事创新的“伪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是一种稀缺资源, 企业作为理性个体会为了争取政府补贴采取主动行为。赵璨等 (2015) 发现企业在争取政府补贴时会采取不同的迎合行为, 盈利状况较差的企业倾向于通过负向盈余操控的方式获得政府补贴, 而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则倾向于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政府补贴。企业在申请驰名商标认定时也会倾向于通过标准相对模糊、易于操作的司法认定方式而不是标准严格且难度较大的行政认定方式, 因为其本身的目的就是借助驰名商标获取政府奖励 (王俊和龙小宁, 2020)。迎合行为最直接的结果是迎合企业达到了自身的迎合目的, 如获得了政府补贴, 但迎合行为会阻碍政府补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赵璨等, 2015), 产业政策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激励也显著减弱 (杨国超和芮萌, 2020)。以上文献证明, 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各类扶持而进行的迎合行为较为普遍, 且这种行为对于企业自身的价值和政府各类扶持政策的有效性存在负向效应。

相比于现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 本文在理论层面考察了政府评奖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多重效应而不是单一效应。评奖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激励

效应，但也可能导致企业的迎合行为，企业还会因为获奖的“信号”作用以及在申报过程中与地方政府建立的良好联系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第二，本文首次尝试采用 DID 模型探究质量奖与企业绩效、创新、补贴等重要变量的因果关系。已有文献中对于质量奖的研究，更多地是在讨论质量奖与企业有关变量的相关性关系，而非因果关系。部分尝试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文献，也存在着样本量较小以及结论不够稳健的问题。

三、研究假说

（一）激励效应

我国设立质量奖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激励和引导企业追求卓越的管理绩效。参照世界三大质量奖（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日本戴明质量奖和欧洲 EFQM 卓越奖）的卓越绩效评价模式，我国制定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T 19580-2012）作为国家标准，企业导入并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是参与质量奖评选的前提条件。国外的相关研究证实了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各类企业持续改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进而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Kaynak, 2003），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Prajogo 和 Sohal, 2003）。国内学者也对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实践也能有效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熊伟和王娟丽，2013；曾珍和王宗军，2017）。因此，质量奖可以激励企业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从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在获奖后，质量奖对企业会产生有形或无形的激励效应。我国的最高质量奖有全国质量奖和中国质量奖两种。全国质量奖的承办单位中国质量协会是国务院国资委领导下和原国家质检总局指导下的全国性质量组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组建了质量协会，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国质量奖的承办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的专职机构，可见全国质量奖和中国质量奖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对企业 and 个人的认可与表彰。因此，质量奖可以为获奖企业起到“信号”的作用，获得政府质量奖的企业往往被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机构、投资者、消费者和合作者）认为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在有政府背书的情况下更容易树立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可靠性，回应利益相关者对其身份和能力的质疑，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进行更为有效的产品推广，进而获得收益并建立竞争优势，提升和改善企业的绩效水平（Blanco-González 等，2015）。此外，获得质量奖也会激发企业管理者的荣誉感（McKenzie, 2017），被高度认可的企业领导者会在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内外部发展机会（Kull 和 Narasimhan, 2010）。当然，获奖企业除了能够赢得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牌，还能得到主办单位发放的一次性奖励金，并且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Howell, 2017），从而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质量管理投入或研发投入。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质量奖评选要求参评企业导入并实践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并且在获奖后会为企业带来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这会激励和促使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I：质量奖评选会激励企业改善质量管理及其他经营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绩效。

（二）迎合效应

与激励效应相对应的一个竞争性假说是迎合效应，指的是企业为了获得质量奖，会在评奖之前对评奖指标进行“修饰”。我国质量奖评选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第一，质量奖评选是一种建立紧密政商关系的重要形式。中国的质量奖评选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质量奖主要的不同在于，中国主要是由政府制定评奖标准、主导评奖过程，同时政府也是发布奖项的组织，而美日等国则主要是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评价为主，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并不参与。质量奖在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设立，让辖区内企业争取质量奖成为地方政府重视质量的重要显性指标。因而，质量奖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是企业配合地方政府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使其可能成为附带各种政商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第二，企业获得质量奖后可能会获得多重收益。企业获奖以后的收益包括：获得质量奖的直接现金奖励，一般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媒体对获奖企业的宣传与报道，可以提高企业的影响力，也会增加企业获得政府各种补贴、荣誉的机会。第三，质量奖的评选面临激烈的竞争。虽然地方政府愿意帮助企业获得质量奖，但是在选择哪一家企业来进行培育时依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企业为了获奖，也倾向于在一些易量化可对比的指标上进行迎合。第四，我国政府评奖的事后监督较弱。质量奖的评选主要是一种基于事前的考核与评价，对于企业获奖后的经营绩效并无要求，获奖企业在发生严重质量安全事件等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取消质量奖^①，但这一类企业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获得质量奖的企业而言，发生较为严重的质量或安全事件的概率较低，这就使得企业事前的迎合行为并不用承担太高的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企业在参评质量奖时，可能产生基于评价标准的迎合行为。《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包含的指标较多，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领导能力、战略水平、过程管理等大多数指标没有年度连续性，且均由专家评委依据企业文字申报材料进行打分，带有一定主观性。而新产品设计周期、生产合格率、准时交货率等量化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差别较大。对于不同类型企业而言，财务绩效指标是随年度变化且相对易于比较的量化指标。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 II：企业在参评质量奖时会在财务绩效指标上发生迎合行为，因而企业财务绩效会在获奖后显著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质量奖评价的大多数指标不易量化，且数据难以获得，企业在这些指标上的迎合行为尚不能验证。本文的假说 II 仅仅是验证迎合效应的一种可能性，即企业在财务绩效指标上的迎合。

（三）补贴效应

企业参加质量奖的评选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按评奖要求，企业需要在评奖之前已经实施卓越绩效管理体系一定年份，很多企业并未实施或实施并不规范，这就需要在经营管理中进行卓越绩效标准的导入和培训等，这些活动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营成本。

^① 详见《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令第 167 号）第三十二条：“获奖组织和个人两年内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发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撤销奖励并公开通报”。

因而，企业需要评估参与质量奖评选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能够超过其成本，企业才会投入资源参与评选。如前文所述，企业获得质量奖后可能会获得多重收益，我们认为政府补贴是其中较为关键和直接的一个方面。质量奖的评选委员会一般由主管企业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出任评选委员会主席，有发改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市场监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商务局、税务局、环保局等多个涉及企业监管和服务的政府部门参与。之所以要这么多部门的参与，是由于评选条件要求对企业经营状况、质量安全状况、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税收状况等方面的指标进行全面审查。因而，获得质量奖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使得获奖企业得到更高的政府信任。在评奖中获胜的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具体承办单位的认可和背书，而且能够获得其他评奖单位的背书。更重要的是，在颁奖环节，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如省长、市长、区长）可能出席并对获奖企业进行授奖，这会增强获奖者在政府各个部门的知名度。在中国特色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官员有强有力的激励来促进当地 GDP 的发展（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分配补贴的自由裁量权（余明桂等，2010），增大获奖企业的补贴资助力度。此外，质量奖的评选程序还要求“层层推选”，即企业若要获得更高一级质量奖需要低一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推荐，因而在企业申报质量奖的过程中，会与各级地方政府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与政府保持联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且关系越紧密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Faccio 等，2006）。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企业在获奖之后获得的政府补贴将有显著增长。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说：

假说Ⅲ：企业获得质量奖以后，会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倾斜，因而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在获奖之后有显著增长。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企业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6—2018 年，其中包括企业名称、证券代码、股票简称、行业名称等企业身份信息，以及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等十多项能够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此外，该数据库中还包括各个企业历年获得的政府补贴、企业负责人的政治关系等指标。

本文的质量奖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企业名称的搜索；二是历年评选委员会发布的获奖企业的公告。这两个来源所获取的企业获奖数据均不完整，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使用这两个来源互为补充。对于多次获奖的企业，我们很难度量每一次冲击带来的影响。不过，多次获奖的企业一般是从低层级向高层级参与评奖，意味着低层级的质量奖获得时间一定早于更高层级质量奖。我们将多次获奖的样本进行简化分析，仅保留最高层级质量奖，以便尽可能识别政策影响。由于 2006 年以前企业的绩效、补贴等关键变量数据不完整，因此本文仅使用 2006—2018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为了使回归系数更易于理解，我们对政府补贴、企业资产总额、专利数和研发支出等指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本文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变 量	代 码	测度方法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方 差	均 值
资产回报率	<i>ROA</i>	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11 230	-0.251	0.209	0.056	0.039
净资产回报率	<i>ROE</i>	净利润/年末净资产	11 230	-0.911	0.359	0.134	0.058
托宾 <i>Q</i> 值	<i>Tobin-Q</i>	市场价值/年末总资产	11 230	0.153	27.338	1.446	2.154
政府补贴	<i>lnsubsidy</i>	政府补贴额取对数	11 230	0.049	12.895	1.708	6.867
企业资产总额	<i>lnasset</i>	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	11 230	19.023	27.487	1.176	21.924
企业存续时间	<i>firm_age</i>	当年年份—设立年份	11 230	1.000	39.000	5.565	14.378
政治关联 ^①	<i>political</i>	—	11 230	0.000	1.000	0.285	0.089
资产负债率	<i>debt_rate</i>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11 230	0.007	1.352	0.203	0.433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11 230	0.083	0.755	0.143	0.347
董事人数	<i>board</i>	董事人数取对数	11 230	1.609	2.833	0.190	2.159
专利数	<i>lnpatent</i>	专利数取对数	10 485	0.000	9.983	1.682	3.840
企业研发强度	<i>rd_rate</i>	企业当年研发支出/企业当年销售收入	5 792	0.050	16.960	3.010	3.986
企业研发支出	<i>lnrd_exp</i>	企业研发支出取对数	5 792	5.100	23.127	1.425	17.837

(二) 回归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资产回报率 (*ROA*)、净资产回报率 (*ROE*)、托宾 *Q* 值 (*Tobin-Q*) 三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进行评估。由于企业获得质量奖的时间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测量企业在获奖前后的绩效和政府补贴的变化情况。基于此,本文将 2006—2018 年获得过中国质量奖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他企业作为对照组,并以此构建三个虚拟变量。(1) 获奖虚拟变量 $treat_i$ 。本文将 2006—2018 年获得过质量奖的企业赋值为 1,未获得过质量奖的企业赋值为 0。(2) 时间虚拟变量 $post_{it}$ 。当年份大于等于获奖年份时, $post_{it} = 1$,其他情况下 $post_{it} = 0$ 。(3) 获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treat_i \times post_{it}$,这是本文所关注的双重差分项。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performance_{it}(ROA_{it}, ROE_{it}, Tobin-Q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it} + \sum_{j=1}^N b_j X_{it} + \mu_t + \sig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subsidy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it} + \sum_{j=1}^N b_j X_{it} + \mu_t + \sig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模型(1)评估企业获奖后的绩效,模型(2)评估企业获奖后的政府补贴情况。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performance* 是衡量企业绩效的主要指标,包括 *ROA*、*ROE* 和 *Tobin-Q*, *X* 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变量。与企业绩效相关的公司治理变量有很多,如企业高管的特征、企业股权结构、独立董事情况和知识产权情况等,本文参考余澳等(2020)的做法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选取企业资产总额、存续

① 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曾为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为 1,否则为 0。

时间、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人数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 *subsidy* 表示政府补贴，控制变量 *X* 与模型（1）相比增加了企业是否有政治关联。 μ_i 和 σ_i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扰动项。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2是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列是获得质量奖对企业绩效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第（4）列是获得质量奖对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获得质量奖对 *ROA*、*ROE* 和 *Tobin-Q* 均有负向影响，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获得质量奖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绩效，其中 *ROA* 下降了约1%，*ROE* 下降了约2.8%，而 *Tobin-Q* 则下降了近0.3。企业获得政府质量奖对获得政府补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在获得政府质量奖后获得的政府补贴随之增加，增加幅度为9%—10%。因此，本文的假说Ⅲ成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获奖对企业绩效和补贴的影响

	<i>ROA</i> (1)	<i>ROE</i> (2)	<i>Tobin-Q</i> (3)	政府补贴 (4)
DID 项	-0.0103 *** (0.0016)	-0.0280 *** (0.0046)	-0.2937 *** (0.0354)	0.0950 ** (0.044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N</i>	11 230	11 230	11 230	11 230
<i>R</i> ²	0.5401	0.3688	0.5996	0.66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后同。

我们进一步检验质量奖评选是否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或使企业产生创新迎合行为。若质量奖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则创新指标在获奖后应显著为正；若存在创新迎合行为，则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获奖之前会有异常的增长，获奖之后会有显著下降。表3的结果显示，评奖对于企业的专利数量、研发强度与研发支出等指标的效应均不显著。结合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质量奖的迎合效应较激励效应明显占优，即本文的假说Ⅰ不成立，假说Ⅱ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结果——获奖对企业创新指标的影响

	专利数量 (1)	研发强度 (2)	研发支出 (3)
DID 项	0.0207 (0.0382)	0.1207 (0.1079)	0.0214 (0.03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N</i>	5 767	4 382	4 382
<i>R</i> ²	0.9325	0.8608	0.9315

(四) 共同趋势检验

表4是本文四个被解释变量的共同趋势检验结果,以企业获得质量奖为初始时间点 t ,在 t 之前的 $t-3$ 期、 $t-2$ 期和 $t-1$ 期,各指标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满足共同趋势假设。

表4 共同趋势检验结果

		<i>ROA</i>	<i>ROE</i>	<i>Tobin-Q</i>	政府补贴
$t-3$	系数	-0.0145	-0.0323	0.0603	0.0764
	<i>T</i> 检验值	-1.42	-1.23	0.32	0.62
	<i>P</i> 检验值	0.155	0.220	0.752	0.533
$t-2$	系数	-0.0017	-0.0077	-0.1159	0.1443
	<i>T</i> 检验值	-0.33	-0.52	-0.81	1.23
	<i>P</i> 检验值	0.744	0.605	0.418	0.220
$t-1$	系数	-0.0058	-0.0352	0.0078	0.0532
	<i>T</i> 检验值	-0.78	-1.39	0.11	0.50
	<i>P</i> 检验值	0.433	0.164	0.915	0.617

(五) 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见表5)和删除县市级获奖样本(见表6)两种方法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由于未能获得企业申报时所有指标的完整数据,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样本之间的差异,本文通过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回报率(*ROE*)、托宾*Q*值(*Tobin-Q*)、企业规模(*lnasset*)、企业存续时间(*firm_age*)、资产负债率(*debt_rat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董事会人数(*board*)等八个变量对企业进行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这八个方面的差异均大幅下降,*T*检验值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各匹配变量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显著小于10,可以认为本文的匹配方法得当。本文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表明获奖后企业的绩效指标均出现显著下降,而获得的政府补贴金额显著增加。删除县市级获奖样本后也得到了和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的结论。

表5 稳健性检验——PSM-DID

	<i>ROA</i> (1)	<i>ROE</i> (2)	<i>Tobin-Q</i> (3)	政府补贴 (4)
DID 项	-0.0099 *** (0.0016)	-0.0270 *** (0.0046)	-0.2577 *** (0.0329)	0.0923 ** (0.04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N</i>	11 108	11 108	11 108	11 108
<i>R</i> ²	0.5482	0.3813	0.6241	0.6604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表6 稳健性检验——删除县市级获奖样本的回归结果

	ROA (1)	ROE (2)	Tobin-Q (3)	政府补贴 (4)
DID 项	-0.0103 *** (0.0020)	-0.0362 *** (0.0064)	-0.4333 *** (0.0454)	0.1869 *** (0.063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9 668	9 668	9 668	9 668

五、进一步讨论

(一) 盈余管理

以上分析均在企业绩效结果层面证实了企业存在刻意修饰经营绩效指标以获评质量奖的行为,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 (Dechow 等, 1995) 计算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进而在操作层面检验获奖企业在获奖前是否进行盈余操作。表 7 的实证结果表明,获奖企业在获奖后的盈余管理指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企业很有可能在获奖前进行了正向盈余管理,以修饰企业绩效。

表7 进一步讨论——企业获奖后的盈余管理情况

	盈余管理	
	(1)	(2)
获奖后	-0.0078 ** (0.0035)	-0.0070 ** (0.0034)
控制变量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N	10 793	10 793
R ²	0.2079	0.2288

(二) 动态变化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在获得质量奖后绩效会下降,但是获得了更多的补贴。企业在获奖之前可能存在两种状态,其一是企业采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后,始终保持较高的绩效水平,直至获得质量奖后由于缺乏激励和监督,绩效下降;其二是企业为了获得质量奖,在评奖之前刻意将绩效指标调高,在获得质量奖后,由于目的已经达成,企业不再对绩效指标进行包装,表现为企业在获奖前进行了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绩效显著提高,而在获奖后绩效显著下降。为了明确企业在评奖前处于何种状态,本文采用模型 (3) 对企业获奖前的绩效指标和盈余管理指标进行动态检验:

$$performance_{it} = \beta_0 + \sum_{m=1}^5 (\beta_m \times before_m) + \sum_{n=0}^3 (\beta_n \times after_n) + \sum_{j=1}^N b_j X_{it} + \mu_t + \sig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下标 i 、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before_m$ 和 $after_n$ 为交乘项 $treat_i \times post_{m或n}$, $treat_i$

为企业是否获奖的虚拟变量，获奖为1，未获奖为0。 $post_{m或n}$ 表示企业获奖前第 m 年和获奖后第 n 年的虚拟变量。例如，A 企业获得过质量奖，则在其获奖前第 m 年将变量 $before_m$ 赋值为1，获奖后第 n 年将变量 $after_n$ 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其他设置均与模型（1）相同。质量奖在申报时往往要求申报企业提供近三年的经营绩效指标，但企业并不能预期其会在某一年份获奖，因此企业修饰绩效指标的行为可能会在获奖前三年左右均有发生，故本文对企业获奖前五年至获奖后三年的绩效水平和盈余管理情况进行了动态检验。表8的回归结果表明，获奖企业在获得质量奖前五年的 ROA 、 ROE 和 $Tobin-Q$ 均显著提高，且盈余管理显著为正，表明获奖企业存在刻意包装经营绩效的行为。

表8 进一步讨论——主要指标的动态变化

	ROA (1)	ROE (2)	$Tobin-Q$ (3)	盈余管理 (4)
获奖前第五年	0.0078 *** (0.0029)	0.0200 *** (0.0069)	0.2839 *** (0.0811)	0.0170 ** (0.0075)
获奖前第四年	0.0052 ** (0.0023)	0.0116 ** (0.0058)	0.1274 ** (0.0572)	0.0176 *** (0.0059)
获奖前第三年	0.0064 *** (0.0022)	0.0123 ** (0.0056)	0.1207 ** (0.0551)	0.0006 (0.0059)
获奖前第二年	0.0101 *** (0.0022)	0.0208 *** (0.0051)	0.0959 ** (0.0472)	0.0124 ** (0.0050)
获奖前第一年	0.0071 *** (0.0022)	0.0106 * (0.0061)	0.1001 ** (0.0475)	0.0116 ** (0.0048)
获奖当年	0.0019 (0.0023)	0.0011 (0.0061)	0.0788 * (0.0478)	0.0098 * (0.0051)
获奖后第一年	0.0005 (0.0023)	-0.0090 (0.0072)	-0.0090 (0.0448)	0.0063 (0.0048)
获奖后第二年	-0.0051 ** (0.0024)	-0.0176 ** (0.0071)	-0.0238 (0.0552)	-0.0008 (0.0048)
获奖后第三年	-0.0069 *** (0.0027)	-0.0221 *** (0.0072)	-0.0662 (0.0566)	-0.0032 (0.00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1 230	11 230	11 230	10 793
R^2	0.5406	0.3692	0.5985	0.2304

（三）时间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迎合质量奖评选标准进行盈余操纵这一短期行为是否真正短视，本文采用模型（4）对企业的长期绩效情况进行了考察。

$$performance_{it} = \beta_0 + \beta_1 t_0 + \beta_2 t_1 + \beta_3 t_2 + \beta_4 t_3 + \sum_{j=1}^N b_j X_{it} + \mu_i + \sig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下标 i 、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t_0 、 t_1 、 t_2 、 t_3 为虚拟变量， $t_0 = 1$ 代表企业在

当年获奖， $t_1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1—3 年， $t_2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4—8 年， $t_3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8 年以上，对照组为未获奖企业。其他设置均与模型（1）相同。表 9 的回归结果表明，在获奖当年、获奖 1—3 年以及获奖 4—8 年的时间范围内，企业获奖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呈现逐渐增大再逐步减小的趋势。获奖 8 年后企业绩效的系数仍为负数，托宾 Q 值的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从长期来看，企业绩效仍受到企业获奖的负向影响。

表 9 进一步分析——获奖时间与企业绩效

	ROA (1)	ROE (2)	Tobin-Q (3)
t_0	-0.0060 *** (0.0021)	-0.0158 *** (0.0058)	-0.1561 *** (0.0440)
t_1	-0.0120 *** (0.0018)	-0.0343 *** (0.0054)	-0.3048 *** (0.0401)
t_2	-0.0110 *** (0.0025)	-0.0261 *** (0.0065)	-0.5028 *** (0.0529)
t_3	-0.0020 (0.0057)	-0.0174 (0.0166)	-0.4574 *** (0.118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1 229	11 229	11 229

（四）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和不同政治关联情况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①，中西部地区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获奖后绩效下降的程度较东部地区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大，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对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王小鲁等，2018），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而言，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较弱，因而企业迎合政府的动机较弱。反之，在市场化发育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企业对于政府的迎合动机也较强。评奖本身就是一种获得政治关联的方式，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对于这一需求更为迫切，更有动机产生迎合行为。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均会在获得质量奖后出现绩效下滑，但是政府补贴的增加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大中型企业上，意味着大中型企业更易存在这样的迎合行为。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理论和政策分析，本文认为政府举办的质量奖评选对企业可能三个效应：激励效应、迎合效应和补贴效应。基于逐个企业查证的方式，本文构建了制造业上市企业获得质量奖的数据库，并将其与企业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述三

① 相应的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支持迎合效应和补贴效应,但不支持激励效应。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企业在获得质量奖之前,其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和托宾 Q 值显著提高,但在获得质量奖之后,绩效指标均出现显著下降,且企业在获奖前进行了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这说明企业在参与评奖之前为了迎合政府的评选偏好,有意改善其绩效指标,使得绩效在评奖之前出现异常的上升。同时,企业的创新行为在评奖前后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说明质量奖对于激励企业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企业获得质量奖之后得到的政府补贴有显著增加,表明获得质量奖对于政府进行补贴资源的分配具有重要的信号作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企业之所以要迎合评奖,是为了获得更多政府的资源支持。第三,企业的迎合特征在中西部地区、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评奖在市场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会带来更强的扭曲效应。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第一,要减少政府干预,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政府不仅要降低市场主体的进入门槛,而且要减少由政府举办的面向市场主体的评奖活动。这些评奖活动可能无助于企业形成更好的市场信号,反而让企业将大量精力用于迎合评奖活动,企业一旦获奖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这给没有参与评奖的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2018 年市场监管总局就曾提出,政府“只设黑榜,不设红榜”,表明了政府不干扰市场信号的决心,但是一个部门的呼吁力量很有限,各部门、各地区政府举办的直接面向企业的评奖活动仍然有增无减。因此,可以按“公平竞争审查政策”的要求,对这些评奖活动进行进一步的清理。第二,可学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将质量奖转移给社会第三方主体来实施,使之成为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的一种第三方服务,政府对于这一类评奖活动进行资助,而不直接参与评奖过程,让评奖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创新、提升效率的作用。目前我国企业质量的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低管理能力的企业较为集中(Bloom 和 Reenen, 2006),这些企业亟需公共补贴以提升其管理水平,这才是政府“帮助之手”可以积极有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黄顺春、盛夏:《政府质量奖制度有效吗?——基于 PSM 方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研究》[J],《会计之友》2016 年第 14 期,第 49—53 页。
2.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0—73 页。
3. 谭小芬、钱佳琪:《资本市场压力与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卖空机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5 期,第 156—173 页。
4. 王俊、龙小宁:《驰名商标认定机制对企业经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J],《经济科学》2020 年第 2 期,第 61—73 页。
5.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6. 熊伟、王娟丽:《政府质量奖实施效果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浙江省 424 家企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07—119 页。
7. 杨国超、芮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J],《经济研究》2020 年第 9 期,第 174—191 页。

8. 余澳、贾卓强、张伟科：《总经理变更类型对国企业绩影响研究——基于来源渠道和产生方式的交叉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12—124页。
9.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65—77页。
10. 曾珍、王宗军：《政府质量奖对质量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J]，《管理评论》2017年第10期，第180—197页。
11. 赵璨、王竹泉、杨德明、曹伟：《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研究——基于企业不同盈利状况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第130—145页。
12.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13. Adams, G., McQueen, G., Seawright, K., 1999, “Revisiting the Stock Price Impact of Quality Awards” [J], *Omega*, Vol. 27, No. 6: 595-604.
14. Blanco-González, A., Cruz-Suárez, A., Díez-Martín, F., 2015, “The EFQM Model as an Instrument to Legitimise Organisations” [A], in: Peris-Ortiz, M., Álvarez-García, J., Rueda-Armengot, C., (eds.) *Achiev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Quality Management*, Springer, Cham.
15. Bloom, N., Reenen, J. V., 2006,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12216.
16. Boulter, L., Bendell, T., Dahlgaard, J., 2013, “Total Quality beyond North Ame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Excellence Award Winn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Vol. 33, No. 2: 197-215.
17. 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P.,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0, No. 2: 193-225.
18. Dosi, G., Marengo, L., Pasquali, C., 2006, “How Much Should Society Fuel the Greed of Innovator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ppropriability, Opportunities and Rates of Innovation” [J], *Research Policy*, Vol. 35, No. 8: 1110-1121.
19. 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J., 200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1, No. 6: 2597-2635.
20. Hendricks, K. B., Singhal, V. R., 1996, “Quality Awards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Fir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Vol. 42, No. 3: 415-436.
21. Ho, D. C. K., Duffy, V. G., Shih, H. M., 2001,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 Empirical Test for Mediation Effec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 39, No. 3: 529-548.
22. Howell, S. T., 2017,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o. 4: 1136-1164.
23. Kaynak, H.,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ir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 21, No. 4: 405-435.
24. Kull, T. J., Narasimhan, R., 2010,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ve Values: Investigation of Multi-level Influences on Workgroup Performance” [J], *Decision Sciences*, Vol. 41, No. 1: 81-113.
25. Lin, C-S., Chen, L-F., Su, C-T., Kon, T-C., 2013, “Stock Price Impact on the Taiwan National Quality Award” [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 24, No. 1: 158-170.
26. Lin, C-S., Su, C-T., 2013, “The Taiwan National Quality Award and Market Value of the Firms: An Em-

- pirical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44, No. 1-2: 57-67.
27. McKenzie, D. , 2017, "Identifying and Spurring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hip: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o. 8: 2278-2307.
 28. Prajogo, D. I. , Sohal, A. S. ,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QM Practices,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Vol. 20, No. 8: 901-918.
 29. Tuck, C. E. , 2005a, "A Quality Award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 16, No. 8-9: 979-986.
 30. Tuck, C. E. , 2005b, "A Quality Award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 16, No. 6: 681-691.
 31. Wen, D. C. , Dai, T. , Chen, X. , Fu, T. , 2017, "A Study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Government Quality Awar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ward-Winning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 [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 28, No. 7-8: 712-729.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wards on Enterprises'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m the Analysis of China Quality Award Using Time-varying Difference-and-differences Model

Luo Lianfa, Wang Shengwei, Zhu Fangjing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organized awards for enterprises are booming. This paper uses the evaluation of China Quality Award (CQ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o study its possible impact on enterprises'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Theoretical analysis believe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CQA may have an incentive effect and a catering effect on enterprises, and awards can bring more subsidies to th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2006—2018 award-winning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bove three possible effe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receiving the CQA, th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drops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enterprises' posi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before winning the award, which verifies the catering effect and subsidy effect but fails to support the incentive effect. This paper implies that the catering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makes the award evaluation deviate from its goals, leading to distor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 quality awards; enterprise performance; catering behavi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2; D21; L53